



博物馆办学术刊物的成功尝试： 《鲁迅研究月刊》

□黄乔生

1990年,《鲁迅研究动态》改名《鲁迅研究月刊》,海内外公开发行。截止到2011年6月已发行350期。

一个博物馆,能办这样一个刊物,而且持续时间长,影响比较大,在学术界是并不多见的。因此,《鲁迅研究月刊》的特色与博物馆办刊有紧密的联系。

博物馆学术刊物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整理馆藏资料。虽然《鲁迅研究月刊》办刊之初,承担着全国研究界发表成果的任务,但因为当时鲁迅研究蓬勃发展,全国还有其他学术机构的鲁迅研究专业刊物出版发行,各刊物不能不有所侧重。鲁迅博物馆承担的科研任务很重,所要整理的资料很多,来稿量大,一时有篇幅不够的压力。因此,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除了内部发行的《鲁迅研究动态》外,还增编了《鲁迅研究资料》,以书代刊,共出24期。《鲁迅研究动态》公开发行后,研究资料停刊,而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全国其他鲁迅研究刊物也相继消失,剩下《鲁迅

研究月刊》苦苦支撑,以至于今。虽然这之后鲁迅研究较少新资料的发现,但月刊仍然肩负着重要的资料补正工作,刊登了很多新发现的鲁迅书信和同时代人的相关资料,及研究者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拾遗补正及对1981年、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校勘、注释等方面错误和失范的修改意见,也刊登了大量以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最近两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正在进行的鲁迅外文藏书研究项目,就属于基础性资料整理和研究,吸引了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有的还因此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基金课题立项。

博物馆是一个弘扬鲁迅精神、普及鲁迅文化的机构。鲁迅博物馆办刊,当然不能一味地在高深的理论上下功夫,而应该注重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注重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影响,所刊载的研究成果应该切近现实,切近广大读者和观众。《鲁迅研究月刊》在占据学术前沿的同时,更注意于鲁迅的影响研究。近年

来,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大中学校的鲁迅接受情况,国外鲁迅接受情况,乃至鲁迅在网民心目中的印象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刊物做了及时的反映,引起了读者的兴趣。通过研究范围的扩大和向更广大读者群的辐射,月刊成为联系学术研究与广大读者的桥梁。

在长期办刊过程中,《鲁迅研究月刊》形成了扎实、笃实的风格,获得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

当前,新形势对刊物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鲁迅研究月刊》应该把握好方向,关注鲁迅研究新动态,及时跟踪学术发展趋势,适时组织重大问题讨论,坚持学术性和可读性结合;要继续发挥博物馆的优势,对博物馆人藏的新资料及研究成果,及时刊载,以此更广泛地团结国内外鲁迅研究者,更有效地利用鲁迅的思想资源,为鲁迅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鲁迅研究月刊》是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目前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鲁迅研究专业学术刊物,是全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因为政治形势的影响,鲁迅的著作和思想被广泛使用和宣传,但也出现一些重利用、轻整理和研究的现象。鉴于此,1975年,鲁迅之子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建议成立相应机构,抽调专业人员,对鲁迅著作特别是鲁迅书信、手稿进行整理,出版社对更准确、注释更完善的版本。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后,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使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力量大大增强。鲁迅研究室调集全国各地鲁迅研究专家到北京,在注释鲁迅著作、编撰鲁迅年谱、出版鲁迅手稿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后来的《鲁迅全集》注释、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室成立不久,就创办了《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参与当时学术界的讨论甚至争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上海鲁迅研究》最初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创刊于1979年,《上海鲁迅研究》始终坚持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其鲜明特色,兼顾理论研究的办刊宗旨,坚持“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成为富有学术个性的鲁迅研究的专业刊物。

迄今,《上海鲁迅研究》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创刊到1987年,此阶段该刊物命名为《纪念与研究》,8年间共出版9辑。这一阶段,刊物坚持以资料汇集为特色的编辑方向,确立了自身在鲁迅研究界的学术特色。其中,专集“周恩来与鲁迅”、“鲁迅与左联资料汇编”、“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资料选编”、“鲁迅佚文汇录”和“中国自由运动同盟资料新辑”、“茅盾论鲁迅(选)”、“友人致鲁迅信十六封”等重要研究资料为新时期起始的鲁迅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其中,刊登在第六辑上的上海市23名肺科专家联合对鲁迅的X光胸片的读片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鲁迅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这次读片会第一次准确地为世人解开了鲁迅的真正死因,从而避免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第二阶段自1988年始,原《纪念与研究》改名为《上海鲁迅研究》,由出版社公开出版,从原来的内部出版物扩展为定期的出版刊物。从《上海鲁迅研究》开始,聘请了许杰、赵家璧、夏征农、陈沂、王元化、罗竹风、杜宣、丁景唐等在上海的著名学者担任顾问,并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主要研究人员组成该刊的编委,王锡荣任编委、责任编辑,从第10辑开始新增主编一职,由王锡荣担任主编至今,期间先后有张岚、王莲芬同时担任主编。《上海鲁迅研究》设置的栏目基本稳定,但又顾及到灵活变动的余地,每辑根据学界出现研究动向、热点现象等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确定了相对系统、连续又开放的办刊格局。主要栏目有:纪念专栏(如“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专栏”等),馆藏一斑,鲁迅生平研究、鲁迅作品研究、史料、考证和书评等。在已出版的16辑中,“馆藏一斑”成为最具特色的风格的保留栏目,它延续《纪念与研究》的传统,先后整理刊发了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史料有:鲁迅丧仪有关文献、周作人译鲁迅校《神盖记》稿、《鲁迅家用收支帐》、《应修人日记》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藏鲁迅剪报》等,又在相应的栏目刊发馆外作者所提供的资料如:胡风《关于30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22条提问》、《王学文谈1936年冯雪峰到上海后解散文委的一些情况》、周楞伽《我的文坛生活与经历》以及《托马斯·B·邓恩》等。同时它还大量刊发鲁迅研究相关的最新资料的考证和最新研究成果,这一阶段刊物不仅实现了资料的汇编与考证的扩展,而且沿着直接有关鲁迅的资料向与鲁迅相关资料的方向延伸,把还原鲁迅个体生活扩充为还原鲁迅所生活的社会的更为宽广的办刊路线。

《上海鲁迅研究》从2005年开始将出版周期从年刊改版为一年固定出版春、夏、秋、冬四辑,新聘贾植芳、徐中玉、钱谷融和杨可扬为顾问,《上海鲁迅研究》自此跨入第三阶段的发展。新版的《上海鲁迅研究》在坚持办刊宗旨编辑方针的基础上,根据鲁迅研究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新要求,在资料汇集成方面,除了及时刊发新发现的鲁迅文物、文献介绍外,更多的则是展开了与鲁迅关系密切的现代文人的史料汇集与整理。如王锡荣整理《一组有关周作人的照片》,鲁迅丧仪签到名录,陈学昭日记、黄源书信选、黄伟经整理的他与梅志和陈学昭往来书信,曹树钧编写的《鲁迅戏剧电影活动年谱》以及日本学者小谷一郎的东京左联资料研究等,2005年冬季号上刊发的一组韩国学者谈鲁迅的文章,在资料和学术上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在理论研究方面,严格按照“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标准采用稿件,使文章的学术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依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朝华文库而展开的专题研究成为《上海鲁迅研究》的新特色,其中有些研究文章(如陈学昭、钱君甸、吴朗西研究等)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性价值。

□李浩

《上海鲁迅研究》简介

《上海鲁迅研究》简介



鲁研百草园中的一朵小粉红花

—《绍兴鲁迅研究》简介

□林白

1983年,为给鲁迅故乡绍兴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平台,32开本的《绍兴鲁迅研究》铅印本与广大的鲁迅研究者、爱好者见面了。其办刊宗旨是:重点发表鲁迅故乡——绍兴的鲁迅研究成果、有关资料、研究文摘、报道研究动态、研究者的近况、文艺作品等。时年93岁高龄的周建人为刊物题写了刊名“绍兴鲁迅研究”。因为是内部刊物,故没有相应地设立编辑部,但时任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秘书长的裘士雄担任着实际上的主编工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刊物由绍兴市鲁迅研究会转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研究中心编辑,并由内刊转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为止。《绍兴鲁迅研究》公开出版后,主编则由鲁迅纪念馆馆长担任。

自出版以来,刊物一直致力于挖掘、纠正与鲁迅有关的史料,早期主要面向绍兴本土,调查的一些民俗风情写成,如《鲁迅与家乡的戏文》《谈谈押牌宝》等,

这些文章后来还结集成《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一书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当时鲁迅研究界的关注。还对一些在绍兴的相关人物进行调查访问,进行抢救性发掘,如《略讲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事情》,出自范爱农之女口,《我所知道的周建人》出自周家近亲之口,《回忆“野风画会”及与鲁迅的关系》是野风画会亲历者吴似鸿所撰,这些资料都显得弥足珍贵。以后,随着刊物从绍兴走向全国,也相应地扩大了史料挖掘的地域和人物范围,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出版后,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之处也成为所刊内容。

鲁迅作品历来在中学课本中占了一定的比重,如何向中学生讲授鲁迅作品,传递鲁迅精神,是每个中学语文老师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从刊物的第三期开始,就开设了专门栏目登载这方面的文章,有注重作品细节方面的教学的,有从整体层面来述说鲁迅教学的。并且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中学语

广东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过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和一声、王任叔关于鲁迅杂文和小说集《彷徨》的重要论文,1938年广州出版的杂志《黄花岗》又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鲁迅与尼采的论文——张震欧的《鲁迅与尼采》。而真正的辉煌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成立了广东鲁迅研究小组和广东鲁迅研究会,创办了《广东鲁迅研究》期刊,把鲁迅研究搞得轰轰烈烈,在全国鲁迅研究界独树一帜。跨入新世纪,广东的鲁迅研究更加红火,成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南国景观。而这一耀眼的景观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鲁迅世界》和《民族魂》杂志。

《鲁迅世界》是在1987年创刊的《广东鲁迅研究》出齐50期以后,于2000年改版而成的。

办刊同仁们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

他们的宗旨是:坚持“三个结合”——研究与学习相结合,研究与宣传相结合,研究与教学相结合。“三个面向”——面向实际,面向青年,面向未来。

北京老专家的评价是:“方向正确,战略对头。”有的专家还加上横批:“闻所未闻”。

各地专家都非常强调《鲁迅世界》的特色:理论联系实际,大众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鲁迅世界》的“史料”和“争鸣”两个专栏最受欢迎。东方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鲁迅论争》一书,有三分之一强的文章选自《鲁迅世界》。

先看“史料”专栏。史实是研究的基础,没有搞清史实就擅发议论,肯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许多扎实治学的鲁迅学家都是主攻史实学的。中国鲁学界很早就形成了这样一支方队,他们从来不说喧哗,不发空论,扎实实地考证鲁迅的生平史料,追寻鲁迅的足迹。这就是鲁迅史实学方阵,是鲁学界一支最靠得住的队伍。《鲁迅世界》的编者最看重的就是这支队伍,因而特设“史料”专栏,对那些一丝不苟、严密考证的鲁迅史学家总是给予特别的优待,不惜篇幅、不计利害,让他们做最充分的表述。例如2001年第3、4期连续两期刊载已故鲁迅史学家卫公即李伟江的《鲁迅赴港演讲始末考》,2002年第3期又刊登了他的后人张钊贻、李桃的《老调子还没有唱完——追溯〈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本源流》。2002年第1期,发表周正章长达3万多字的《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真相》,反响强烈,曾引起广泛兴趣。江苏省鲁迅研究会还专门为此次举行一次座谈会。2002年第4期,又以整整15页版面刊登了王锡荣的长文《鲁迅死因之谜》,从鲁迅X光片会引起轩然大波到鲁迅病史摘录、病史溯源、鲁迅自己的说法、当时报纸众说纷纭的报道一直到对八个疑点的解疑、真正疑点的分析、难解之谜的推测等等,真可谓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然而,《鲁迅世界》绝不局限于一家之言,又在2003年第3期刊登了周海婴的《〈鲁迅丧葬费用之谜〉的解谜》和周正章的《关于鲁迅死因的几个医学问题》与王锡荣争鸣,以期得到更为贴近原貌的史实和更为圆满的解释。

这样,就自然要谈到《鲁迅世界》的“争鸣”专栏。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具有特色、最吸引海内外鲁学界眼球的了。从2000年至今三年多时间,《鲁迅世界》就开展了鲁迅死因、“毛罗对话”、“在农民问题上鲁迅错了没有”、“在与梁实秋的争论中鲁迅输了吗”等大小长短不等的多次争鸣与研讨。并发表了《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20世纪末的鲁迅论争》《“毛罗对话”论争综述》等有关鲁学界争鸣的综述文章。确如《鲁迅世界》主编郑心伶所说:“论争中的活鲁迅总比‘死了的鲁迅’更引人关注,讨人喜欢。”开展这种争鸣的确给海内外鲁学界增添了活力。

当然,每期最惹人注目的是《鲁迅世界》主编郑心伶的卷首语,话虽不多,却句句切中现实的要害、传达时代的心声。我们应该承认个人对于历史的作用,广东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如此发展兴旺,《鲁迅世界》之所以能够这样光照南国,与有“南天一柱”之称的郑心伶的个人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最近,广东鲁迅研究会又与香港窗口出版社合作,变《鲁迅世界》为《民族魂》,美观大方,内容更加充实。目前已经出到三期。

可以预言,《民族魂》必将越办越红火,越办越兴盛,这一处中国鲁迅学史上的南国景观也将更加璀璨瑰丽。

活》,一个小小的地方内部刊物要登出这样的文章,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这种精神在以后的编辑者中一直保持着。

纪念馆从成立之初就受到了各界领导、学者的推崇,来纪念馆的嘉宾较多,而他们也乐于在纪念馆内留下墨宝,早期的刊物前几页都是这些名人访绍兴所留下的题字或签名,据粗略统计,共有50余位名人的墨宝在刊物上出现。他们中有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也有文化名人贾平凹、鲁迅学生、研究者黄源、萧军、史莽等,见证了本馆的足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2005年,连续三年的刊物前几页上,还刊登了一组与鲁迅有关人物的照片,这是以前未被披露或发现的,填补了鲁迅研究资料上的一点空白。

“鲁迅研究动态”主要讲述相关鲁迅书籍出版消息、临时展览举办情况、来绍兴参观的嘉宾接待记录等,虽然短小,但非常精悍,因为主要侧重于绍兴地区,可说是囊括了80年代以来绍兴地区纪念、宣传鲁迅的概况。

纵观近30年的30余本《绍兴鲁迅研究》,其成果虽无法与大刊物相比,但作为鲁迅故乡的一份小小刊物,还是在努力宣传、研究鲁迅上尽着自己微薄的力量,并且其稿件来源和发行范围,也已从绍兴、浙江,走向了全国。

(作者系《绍兴鲁迅研究》编辑)

—《鲁迅世界》《民族魂》简介

□沈哲

南国的鲁迅研究景观